



# 一张“纸”的红色记忆与当代新篇



叶挺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是一片烙印着新四军抗战足迹的红色热土。1938年,新四军军部进驻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叶挺、项英等在此指挥华中敌后抗战。这里也是被誉为“宣纸之乡”的皖南小城,“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的宣纸,既承载着千年不辍的造纸记忆,更沉淀为这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标识。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宣纸研究所所长黄飞松介绍,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迁至泾县云岭。与此同时,曾是当地主导产业的宣纸产业因国土沦陷、交通不便等因素遭受重创,所有纸槽几乎停工,纸工流离失所,宣纸制作这门传统技艺也濒临失传。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为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受损害,同时解决宣传工作的用纸难题,创办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既守护了宣纸制作技艺,又推动了产业发展。随着宣纸产业迎来“重生”,由新四军在皖南创刊的《抗敌报》有了稳定纸张来源,这份报刊在新四军内部乃至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敌后战场的宣传利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对宣纸产业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宣纸制作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活力。”黄飞松说。

如今,人们仍能在追寻新四军身影时找到宣纸的痕迹——在新四军军部旧址,叶挺等同志的房间里仍保留着当年糊在墙壁上的宣纸,天井漏下的日光经宣纸反射,让昏暗的屋子变得格外亮堂;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内,由宣纸制作而成的《抗敌报》告别原件保存完好,静静向后人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一张薄如蝉翼的宣纸,在战争年代,承载着革命历史的厚重与民族文化的坚守;而在和平年代,这份匠心传承焕发新的生机,成为一方水土向新而行的底气。

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泾县立足文化资源优势,跳出“造纸卖纸”的传统发展思路,推动宣纸产业与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深度融合,古老的宣纸又一次迎来“新生”。

走进位于中国宣纸小镇内的宣纸博物馆,展厅里,图文交织的长卷清晰铺陈着宣纸制作中浆灰、踏皮等108道工序,讲述着草履粉身碎骨、百炼成纸的故事;非遗体验馆内,传承人的指尖在竹帘与纸浆间翻飞,游客们在驻足观摩制作工艺之余,还能亲手体验捞纸、晒纸、拓印等工序;舞台上,身着古韵服饰的演员们全情投入,正演绎着沉浸式新媒体互动表演《只缘身在纸山中》……

“如今的游客已不满足于欣赏单纯的山水景致,更渴望在旅行中领略当地特有的文化底蕴,感受独一无二的文化体验。”宣纸小镇负责人刘爽表示,“近年来,我们积极转变发展思路,从‘造纸卖纸’到‘以纸载文’,加快推动宣纸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如

今,这里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宣纸文化的窗口。”2024年,中国宣纸小镇游客量41万人次,同比增长64%,带动宣纸销售、文旅、文创、餐饮、酒店等相关产业就业约850人。

宣纸小镇只是泾县探索宣纸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如今,泾县全域正加快推动宣纸产业与红色文旅、节庆等跨界融合,激活古老非遗新活力。发布“纸墨古镇·红色记忆研学”旅游线路,将当地重要革命旧址、宣纸文化园等文旅地标串珠成链,使非遗探索与红色文化巡礼紧密结合;举办宣纸文化艺术节、“宣纸中国与当代生活美学”高峰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泾县,千年文脉早已流淌成向新而行的澎湃动能,让这片土地成为一座没有屋顶的活态“宣纸博物馆”。

当宣纸加速走进大众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加入了守护宣纸的队伍。宣纸文化园讲解员曹平今年30岁,从爷爷辈开始,她的家人就与宣纸结缘。如今,她从祖辈手中接过“接力棒”,通过细致生动的讲解,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宣纸的故事。“祖辈传下来的制作宣纸的硬功夫,而我的使命则是让宣纸里的故事、文脉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使古老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历久弥新。”她说。(据新华社)

## 抗日英雄廖海涛:舍家取义 血战塘马

阳光明媚,青山如黛。巍巍双髻山脚下,闽西上杭县溪口镇大岭下自然村里,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革命纪念馆。这座亭子纪念的是当地走出的抗日名将廖海涛。

1941年,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廖海涛为掩护新四军十六旅旅部机关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突围转移,率部与日伪军浴血奋战,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大岭下村是革命基点村。1929年4月,当地成立了农会,刚入党不久的廖海涛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廖海涛出身贫苦家庭,参加革命后,根据组织安排参与策划多次暴动;发展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吸收超八成村民;建立乡、区苏维埃政府并任领导职务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1931年,闽西红军兵工厂迁到大岭下村。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间,廖海涛先后任新成立的中共代英县委领导和中国工农

红军代英独立营营长等职务,持续在上杭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各级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在大岭下村旁的双髻山等据点建立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廖海涛领导的队伍也长期活跃于此。

“在此期间,反动势力采取各种毒辣手段,对根据地军民疯狂报复。”上杭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李金昌说,廖海涛付出母亲、妻儿被杀的代价,但他始终坚定“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的信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海涛于1938年3月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苏皖抗日前线并担任四团政治部主任,在恢复、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先后参与和指挥战斗数十次。

1941年11月28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十六旅旅部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村突遭敌袭。廖海涛毅

然拒绝先行突围,率500多名战士阻击7倍于己的日伪军,从28日凌晨激战至上午十时许,后遭敌军火力覆盖,中弹牺牲。

廖海涛牺牲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军,高度评价廖海涛“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

2003年来,当地先后在大岭下村原有革命纪念馆设施基础上,修建了革命纪念馆、抗日英烈廖海涛生平事迹展馆等,并提升改造为“忠诚”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中小学生、干部职工都会前来开展祭扫、学习活动。

“近年来,我们还组织编写了《红色溪口》等红色历史教育丛书,并深挖红色资源,发展研学游、乡村游,学党史、传先辈精神,走好未来的路。”溪口镇党委书记王如永说。

(据新华社)



廖海涛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 扶山寨反击战

1934年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向葛藤山地区行动中,收到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信,呈述党中央派来鄂豫皖工作的程子华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红25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省委当即决定率部赶赴鄂东北。

11月6日至7日,在敌5个“追剿”支队尾追的情况下,红25军以破竹之势,连续突破敌人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交界地区设置的重重封锁线,于11月8日拂晓进入光山扶山寨地区。

由于长时间日夜行军作战,红25军首长决定,让部队在扶山寨稍事休息再继续西进。红25军随即布置警戒:军部及军直属队位于扶山寨以西地区;第74师1营、3营位于扶山寨东北的沙岗,2营控制扶山寨制高点;第75师223团位于扶山寨以东的刘湾,224团位于扶山寨以南的朱家坳;手枪团位于扶山寨西北方向担任警戒。

红25军休息不久,敌第107、第117师各一部和第4“追剿”支队(第64师3个团)、第5“追剿”支队(第65师3个团)即跟踪而至,趁我警戒部队极度疲劳、疏于戒备之际,从东、南两面发动突然袭击,企图夺取扶山寨制高点。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乘飞机督战,并派飞机向红军阵地轰炸、扫射。第74师2营坚守扶山寨制高点,奋勇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处境十分危急。在此情况下,军首长急令该师1营、3营增援。全师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守住了扶山寨。

这时,第75师224团与军部会合。军首长进一步分析情况,认为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只有坚持守住阵地、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遂当即命令:第74师继续扼守扶山寨制高点,从正面抗击和消耗敌人;第224团从扶山寨北迂回到刘湾北,协同第223团向敌第107、第117师实施突击;而后,第224团迂回到朱家坳以南,第223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第74师协同攻击敌第4、第5支队。

部署就绪后,第224团沿扶山寨北山坡隐蔽迂回到敌第107师侧后,突然发起进攻,第223团亦乘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撤退。接着,两个团协同猛攻敌第117师,使其溃退。而后,两个团集中力量向敌第4、第5支队的侧后猛击,第74师也乘机发起反击,将敌压至朱家坳一带。敌军在红军三面夹击下,纷纷溃乱。整个战斗到黄昏胜利结束。(据《中国国防报》)

## 徐悲鸿创作《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秋,为了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筹集捐款、救济难民,徐悲鸿远赴南洋举办画展。就在徐悲鸿抵达新加坡时,著名话剧演员王莹已在那里马不停蹄地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放下你的鞭子》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流离失所、卖唱为生的故事,旨在揭露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激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放下你的鞭子》在大江南北广泛演出后,极大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日斗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莹和金山等文艺工作者于1939年赴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巡演,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10月的一天,徐悲鸿在新加坡街头徜徉时,适逢王莹等人在广场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于是驻足观赏,不由得深受感动。徐悲鸿回到住处,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一幅高144厘米、宽90厘米的同名油画。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折射出在日寇铁蹄无情践踏蹂躏之下,中华民族奋起御侮的不屈意志,真实反映了当年海外华侨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以及慷慨解囊、勠力同心,携手支持长城内外浴血抗战的赤子情怀。(据《人民政协报》)

## 古代学生的假期

进入七月,全国各地大中小学都放暑假了。那么,古代的学生是如何度过假期的呢?

查阅中国古代典籍,已知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官办学校——“太学”就已经出现了,太学里就读的学生叫作“太学生”;隋唐以后,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太学生、监生都是有寒暑假的,分别叫作“旬假”“田假”“授衣假”。旬假类似于现在的双休日休假制度,即上10天学,学生就可休息1天。“田假”类似“农忙假”。《新唐书·科举制》中明文记载:“每年五月有田假。”农忙季节,学校即可给学生放“田假”,让他们回家帮着搞农业生产。“授衣假”一般在秋天放,主要是让学生回家去取过秋、过冬的衣服。所以《诗经》《新唐书》中均有“九月授衣”“九月有授衣假”的明确记载。

那么,古代的学生在假期里都做哪些事呢?通过阅读典籍得知,古代学生的假期内容并不比现在的孩子差,相反,好多内容倒令现在的孩子望尘莫及、羡慕不已。

参加劳动。古人深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道理,所以,放假期间,家长们有意让孩子们参与生产劳动,在劳动中了解农事,增长本领,锻炼身体,培养和提升孩子们的“家庭成员意识”。比如宋人范成大的

《四时田园杂兴》诗中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孩子虽小,也和大人一起种瓜。“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孩子们和大人一起下田插秧劳动。“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舂碓,童稚携壶浆。”农忙时节,大人忙着割麦,孩子则力所能及地做些送水送饭的“轻型农活”。耕牛是古代农家的主要“劳动力”,所以很多孩子放假后,帮着家里放牛,这类古诗举目皆是:“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村舍麻鸡驱鸟雀,牧童随草放牛羊。”“蒿莱织妾晨炊黍,偶落耕童夕放牛。”“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

四方游学。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趁着假期,到四方去寻访高师名士,登门求教,为自己“充电”。古代民间多有饱学之士,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官办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据典籍记载,假期游学是汉代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和特征,当时有很多学子利用假期,不远万里,游走全国各地,求师访士,研学实践,借以锻炼自我,增长才干。汉代也因此涌现出许多知识渊博的名士大师,他们大多有着丰富的游学经

历。以《两都赋》名垂青史的班固曾游学各郡;许慎、周举、蔡玄、张兴、丁鸿等名士被史籍誉为“五经纵横”“五经无双”,他们均有过年轻时游学切磋经学、开阔视野的经历。

坚持学习。放假并非“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古代的官学提倡学生假期内也要坚持学习。清嘉庆年间《义学条规》中写道:“长不辍耕,幼不辍读。”意即大人到了夏天不能停止劳动,小孩到了夏天也不能停止学习。“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古代的官学在放假期间虽未留有“假期作业”,但假期学习还是耳提面命的。

游戏玩耍。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假期漫漫,孩子们自然要寻找各种玩耍的乐趣。在历史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游戏的项目:骑竹马、玩陀螺、踢毽子、抖空竹、捉知了、粘蜻蜓、钓鱼、剥莲子、捉萤火虫……他们的假期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多趣起来。“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此诗惟妙惟肖地写出了孩子们捕知了的神态。“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一句“遥招手”“不应人”,形象地写出了孩子们钓鱼时的趣味和情态。“小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短短数句,既道出

了“村庄儿女各当家”的社会现实,又写出了童心灿烂、童趣盎然。“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一个东张西望寻找黄蝶的小儿形象,呼之欲出!还有一种儿童游戏叫“捉柳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一个“捉”字,把小童好动的形象刻画得出神入化。

勤工俭学。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学生会在假期用在校所学进行各种形式的“勤工俭学”。比如书画好的学生在街头摆个书画摊卖画,文笔好的学生在衙门口代写公文诉状,等等,以此来赚取下一学期的学费。

看来,古代学生的假期还是过得丰富多彩呢。(据《山西晚报》)



## 古今“教授”意不同

在古代的典籍中,经常出现“教授”一词,于是便有一些人误将古代的“教授”理解成当今的“教授”。其实,古今的“教授”一词虽写法、读音相同,但意义却是不同的。今天的“教授”一词是由古代的“教授”演变而来的。

“教授”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汉武帝时期,官府设立“太学博士”一职,主要职责是教授学生知识。那时的“教授”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意为传授知识之意,可以理解为“教书”。而“博士”,才相当于今天我们熟悉的“教授”。

宋太宗时期,宗学王官子弟的老师被称为教授,“教授”首次成为一个名词。到宋仁宗时,宰相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教育上在中央和地方的学校设立“教授”一职。在一些诸如宗学、律学、医学等的专门学校中,“教授”便是教师,负责传授知识或技能;而在各路的地方、县学中的“教授”,则是地方专门负责教育事宜的官方机构之长官,官职正七品,负责科举考试、教育内容设定、监督教学纪律等事情。元代沿用宋代“教授”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赢得士人之心,第二年便开始制定教育制度,在府州县三级均设立学校,并规定各府学设一名“教授”,各州学设一名“学正”,县学设一名“教谕”。自此,“教授”开始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教师称谓。

清朝时,“教授”大致沿用明代的职责,但其教师属性又有所减弱,增添了官员属性,具体负责评价学生品行优劣、督促学生学习等,大体相当于今天中学中的“教导主任”或教育局中的“督学”一角。但其资历出身相当高,必须由进士出身的担任。清代“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就曾出任过江南府(今江浙一带)的“教授”。

清末洋务派兴办的大学中,设有正教员、副教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教授、副教授——“教授”一词正式成为现代大学教员的称呼。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未变,使用至今。(据《山西晚报》)